

日本維新史

[加拿大]諾曼著

姚曾虞譯

商務印書館

日本維新史

〔加拿大〕諾曼著

姚曾虞譯

商務印書館

1962年·北京

本书原名《近代日本的出現》(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加拿大 E. H. 諾曼(E. Herbert Norman) 著。譯本根据美国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New York, 1940 年版譯出。

日 本 維 新 史

(加拿大) 諾曼著 姚曾廣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KZ〉統一書号: 11017·122

1962 年 11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178 千字
印張 7 14/16	印數 1—2,000 冊
定價 (9) 1.10 元	

引 言

这是一本资料比較丰富又有一定見解的关于明治維新和維新后几十年間历史的书。

作者 E. H. 諾曼是加拿大人，1909 年生于在日本傳教的牧师家庭。1933 年他在托倫托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劍桥大学研究英国和欧洲中古社会經濟史，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日本和中国問題，1939 年从哈佛获博士学位。这本书就是在学位論文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于 1939 年入加拿大外交部，从 1940 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加拿大駐日使館任职，同时研究日本近代史。日本投降后，任加拿大駐日首席代表。1950 年归国，历任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长、情报司长等职。1953 年任加拿大駐新西兰高級专員。1956 年任加拿大駐埃及大使，1957 年 4 月墜楼自杀。著述除本书外，还有《日本的兵士与农民——征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 of Conscription, New York, 1943)、《安藤昌益与日本封建主义之解剖》(Ando Shoeki and the Anatomy of Japanese Feudal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Third Series, Vol. 2, Tokyo, 1949) 和尚未刊行的《日本政治的封建背景》(Feud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Politics)。

本书以夹叙夹議方式論述从明治維新經過制宪法、开国会到日俄战争这三十余年間的历史，从維新背景和过程談到維新后的工业、农业和政治等方面。作者参考了不少书，并利用了战前日本

資產階級學者的研究成果，書中的資料對於研究明治初期歷史頗有裨益。

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和解釋明治維新以後的歷史發展。但他在擺脫偏見、比較認真地研究資料的情況下，也得出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同意的結論。明治維新後政府所採取的政策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道路，具有進步意義，關於這一點，作者給與了正確的估計（第 97—99 頁）。關於明治維新的領導，作者說：“幕府的推翻是通過以下級武士和浪人，特別是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等西部強藩的下級武士和浪人為領導，伙同少數公卿，在大阪和京都的巨商富賈的財力支援下的反德川勢力的結合而獲得實現的。這個劃時代的變革的領導權是握在下級武士的手裡，那些下級武士逐漸取代上級武士和封建領主而為當代的政治發言人”（第 51 頁）。這樣看法也是恰當的。作者分析明治維新後的農民運動，認為是反封建的、革命的，但也有一二次農民鬥爭為反動武士所利用，以求達到他們回到武士支配的舊社會去的目的（第 72—76 頁）。這樣分析應當說是確切的。作者說“自由黨所體現的日本自由主義自始就具有溫和妥協的性質”（第 174 頁），這樣論斷也符合實際情況。

作者有些論點言之成理，但不夠全面，未能觸及問題的本質。在論述封建勢力和商人聯合的歷史背景時，作者指出：“最重要的事實卻是在純封建關係的傾毀之中一個新地主階級的逐漸成長，而那個階級正日益感到在農業領域內以維持修正的封建關係為有利，因此和封建階級的大名比和農民更加利害相同”（第 54 頁）。“從農民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封建當局和新地主階級這兩方面的經濟榨取是一併加以反抗的”（第 55 頁）。封建領主和新地主都屬剝削階級，利害一致，他們都遭到農民的反對，從根本

上讲这样看法是正确的。但作者又认为，旧封建統治者和新地主这两个集团“随着德川时代漸近末期而日益靠攏”（第 56 頁），則不全符合事实。这样就忽視了两个集团間的矛盾，而到明治維新前夕这个矛盾恰恰尖銳起来。封建大名領地制严重阻碍資本主义的发展，幕府与多数的藩都抑制新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但新兴地主和商人在維新前夕却对資本主义关系抱着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并不与封建大名集团靠攏。领导維新运动的下級武士意在推翻頑固保守的德川幕府，为資本主义开辟道路，他們反对大名領地制。但另一方面他們远非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相反，新政府成立后皇室和許多皇族、华族都成为新地主，封建关系在农村仍占統治地位。因为一个剝削阶级代替另一剝削阶级統治后，总是保存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前一社会阶段的残余，作为輔助剝削和統治的工具，例如世界各国历史上几乎很少奴隶制残余已經絕迹的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里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封建制残余。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制度。日本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沒有足够力量推翻旧事物——封建生产关系，而封建制度也已沒有足够力量否定和抗拒新的生产关系，于是出現了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的妥协，新政府利用农村的封建关系为发展資本主义服务。事实上，日本的原始积累很大部分依靠剝削农民的地稅，日本农村长期供应廉价劳动力，成为城市資本主义的附庸。二次战后日本反动政府才开始企图迫使大量农民“离农”，推行农业的資本主义化政策。如果說維新前后日本的新兴地主与资产阶级靠攏，大体符合当时情况，如果說他們与封建大名靠攏，似乎与事实不尽相合。

在論长州藩改革时，作者說：“开明党在长州的胜利乃是同样势力在 1867—1868 年以及此后数年間在全国舞台上胜利的一个

先声”(第 67 頁)。下面作者又指出：“这些藩政改革非特无补于农民的解放和为制造业建立一国内市場，反而通过独占制，通过将貢米折收货币以及不惜加重农民的困苦而抽征新稅的办法来維持高物价。因此，在商业資本势力雄厚、工場生产初奠小規模基础的这些富足的倒幕各藩之内，农民反抗之所以反而最为激烈、最为持久，并不是事出偶然的”(第 69—70 頁)。这些看法都有理由。但作者沒有指出，藩政改革一方面是明治維新的先声，一方面却和明治維新仍有根本不同之处。明治維新改变封建大名領地制度的基础，允許土地私有和买卖，农民比德川幕府統治时获得較多的自由，为广泛发展資本主义开辟道路。以后政府又用办模范工厂和廉价售給私人等方式促进資本主义經營。各藩的改革却不如此，并未触动原有的經濟基础。工場由藩政府經營，也并非完全依靠雇佣劳动，薩摩藩工場的封建性尤其濃厚。如果单說藩政改革是維新先声，便会把两者的性质混同起来。

关于五条誓文，作者說“是以众所习知的和可以接受的詞句来表达全国人民大众的反封建欲望的一项文书”(第 93 頁)。这样評述基本正确，但对五条誓文制定过程和各条具体意义論述似乎不够。五条誓文最初由由利公正起草，第一条是“使庶民遂志，人心不倦”，第五条为“万机决于公論，勿得私論”，暗示着較多的政治上的民主。后經福岡孝弟修改，第一条改为“兴列侯會議，万机决于公論”，实际是主張只征詢大名意見，“庶民”被排除在外。最后木戶孝允定稿，第一条改为“广兴會議，万机决于公論”，含糊其詞，說明当时政府当权者对于仅仅名义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都不敢許諾給人民。定稿第二条“盛行經綸”意为振兴实业即推行資本主义。第三条“官武一途”指公家与武家合作，“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指廢除身份等級制。第四条“打破从来之陋习”指与外国交往。五条誓文

集中表达了維新政府內政外交的主要綱領，應該予以充分估計。

尽管作者在某些問題上作出正确結論，对另一些問題提出虽不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的看法，然而在唯心史观指导下的作者对一些根本問題却没有触及它的实质，于是得出錯誤的結論。作者論述明治維新背景的第二章中，对于推翻幕府这一斗争中作为基本动力的农民完全忽略。明治維新章中列了“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一节，但对农民打击幕府政权的作用估計得极低，同意一个日本学者的看法：“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置身于革命之外”（第72頁）。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創造者，日本农民虽未能领导这一运动，但长期的反抗斗争尤其維新前几十年間各地頻繁爆发的农民和市民斗争震撼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斗争，下級武士和少数貴族根本不可能推翻幕府。和一切唯心主义史学家一样，作者在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力的同时，对于个别上层人物則給以过分夸大的估价。作者在結束“明治維新”一章时說：“偕維新以俱来的那些划时代的变革是由最能干、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藩閥軍事官僚所組成的一个政府来实行的。……这些軍事官僚在日本建設現代国家之际，乃是进步的先鋒，現代化的前卫”（第103頁），就是过分夸張个人作用的一例。

作者唯心史观的另一表現是強調事物发展的外因而忽視內因。在論述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时，沒有从当时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階級力量的对比和消长等方面考察，研究矛盾如何得到解决，却只強調英国当时忙于侵略中国，“給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第48頁）。国际环境和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間的矛盾是必須考虑的重要因素，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当时騰不出手来破坏日本的资产階級革命，这也是事实，但如果以此为明治維新成功唯一的、主要的原因，岂非本末倒置？

从上述作者略历可以看出，他是参預加拿大政治外交的統治階級上层分子，因此，帝国主义学者为殖民侵略辯护的倾向在本书里也必不能免。美国打开日本大門后，日本被迫訂立不平等条約，关税不能自主，大量生絲、蚕卵紙等原料輸出，外貨傾銷打击本国工业产品。西方列强炮舰轰击，并在日本駐兵。英法还参与幕府与西南大名之間的政治斗争。当时日本各阶层有識之士都觉察到淪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險，这个威胁在推动倒幕运动起了很大作用。这里作者却不再強調外因，反而說日本貧瘠衰弱，西方列强不屑来侵略，“若将西方列强开放日本的努力解釋作为打算乘人之危来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有計劃的企图，則不免过甚其詞”（第50頁）。这不是显然在为西方列强特别是为当时的美国狡辯嗎？

本书所附参考书目提要和日本名詞解釋对于中国讀者也有用处。但是书目只限于資产階級学者著作，本书完成时已經問世的野呂荣太郎同志的《日本資本主义发展史》和馬克思主义者集体編写的《日本資本主义发展史讲座》都是研究明治維新极为重要的著作，而未列入，不能不說是有意的也是严重的遺漏。

周一良

1962年8月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5
第二章 明治維新的背景	13
第一节 封建制度的衰頹	13
第二节 打破海禁	37
第三章 明治維新	51
第一节 封建勢力和商人聯合的历史背景	52
第二节 藩獨占制及其对封建勢力和商人关系的影響	58
第三节 資本主义的輸入各藩	60
第四节 封建勢力和商人的聯盟与明治維新	62
第五节 在藩政改革运动中現代官僚階級的誕生——长州藩之例	64
第六节 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1868—1877 年)	71
第七节 作为明治維新領導者的下級武士	81
第八节 因征韓論而引起的分裂	86
第九节 同政府的繼續对立終釀成为內战	88
第十节 明治政府的反封建政策:对封建諸侯和地主階級的态度	92
第十一节 結論:制約日本建成为現代国家的諸因素	102
第四章 初期的工业化	104
第一节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104
第二节 分工	105
第三节 資本积累	107

第四节	欧洲重商主义和日本重商主义的比較	109
第五节	日本銀行資本的优越地位	112
第六节	外国資本在日本初期工业化中所发生的作用	115
第七节	战略性工业的沿革和影响	118
第八节	在軍事需要制約下的日本工业化的出发点	126
第九节	工业政策的变更和国营工厂轉让的法律規定	128
第十节	关键性工业和官僚階級	133
第五章	土地改革及其社会后果	136
第一节	土地私有的趋势	136
第二节	1873 年的地稅改正	138
第三节	农民的丧失土地	144
第四节	日本农民的丧失土地及其影响——日本与英国的 对比	148
第五节	日本农业的零星經營, 其原因及結果	153
第六节	日本佃农的社会性质	156
第七节	停滯的过剩人口問題和劳动市場的形成立	157
第八节	国内市場的形成立及其限制	161
第六章	政党和政治	168
第一节	第二期农民运动 (1877—1883 年) 和自由党的誕生	168
第二节	初期政治团体及政党的概況	175
第三节	政府对待政党的政策	178
第四节	1884 年自由党解散后农民反抗的新轉变	181
第五节	国家权力的强化: 1889 年的宪法	185
第六节	政党和議會	190
第七节	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193
第八节	为了国家独立, 如何不可避免地走上扩張的斗争	196

第九節 自由黨反對派的立場和日本政府內部“軍政之間”的	
問題	200
結論	207
明治史參考書目提要	210
西文書目	218
日文書目	226
西文雜誌論文	228
中文論文	232
日文雜誌論文	232
日文名詞及成語注釋	233

第一章 緒論

这本书的目的是打算先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日本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外交政策的明治改革的那些特点并加以分析，然后再探讨其发展过程，自封建制度末期起，寻踪索迹，以迄于十九世纪末叶国家权力在新制度下奠定时为止。虽然也触及到了一些附带的問題，但全书的中心問題却是要闡明明治維新（1868年）以后一个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的国家的迅速成立，以及在国家扶植与統制的情况下一種工业经济的发展。

这篇緒論不期而然地一下手就要把得自前一个时代的一些概括結論同現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本篇所打算作的这番努力只能占很少几頁篇幅，所以这就有待于讀者去将现代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一番比較，揚棄其不相干的和暂时性的事物，探索明治政府中比較根本的和意义深远的特质，从而測定其对于近半世紀来日本政策实施的影响。希望讀者能經常不忘記現在，这样，如果在这本书中能发现什么有兴味或有价值的东西，也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了。

这篇关于明治时代的历史論文中的一些事物，对于一位研究1940年日本的讀者，一古一今，似乎是距离太远了。然而明治日本的許多事物都一直流傳至今，甚至在現代日本中反而昌盛起来；官僚階級和軍人阶层的发达和繁衍；政党和議会的懦弱无能；国家对企业的干涉；小型工业的丛生；西洋技术的用来适应日本需要；以人口过剩的农村、小規模的农地和缺地少地的农民为特征的农业上的周而复始的危机；国内市場购买力的薄弱——所有这些都是

形成日本生活的一些比較显著的現象。这些問題如果对于明治时代沒有一定的認識就不能理解。作为明治时代的背景来看，則前此的德川时代的突出的特点便又至关重要了，因此第二章特将1868年維新的历史背景作了一番交代。

佛教的因果报应論举出例子来闡釋一个令人感到厭煩的不解自明的道理，即先前的事物通过原因和結果的連鎖，必然要塑造和制約后来的事物；因而学者总是追溯既往，以期探本求源。然而我們却不必像全盘接受佛教教义那样，承认人事上和国事上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宿命論。历史发展的洪流所行經的渠道是一半确定了，但是間接予以左右的人的意志却可以变更它的进程，虽然不能完全阻塞其去路。日本的情形亦复如此；图样但凭明治时代的建筑师們去画，但材料大部分是現成的，这是前代的遺產。

就日本的情形而論，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所产生的問題并沒有任何事前注定的解决方案，但是既为德川时代的遺產所制約，它的選擇或变更的余地自比某些先进的現代国家要更少一些。然而这种限制本身却可以变成有利的条件，正如明治先驅者們所解釋的那样。他們能够以前途的重重危險来警告国人，打消妄想通过任何捷徑以實現烏托邦或帝国的一切迷梦。因而政治和外交在他們灵活的手里就变成了一种无限复杂的柔术，一种轉弱为强、轉复敗而为新攻势的技巧。他們認識到，从已經陷国家于衰敗之境的封建制度中迟迟解脱出来的一个国家，要想向任何一个称霸世界的强国挑衅，甚至想和搖搖欲墜的清朝冒險一战，都需要在新政权之下費一段時間和一番心血来休养生息的。对于日本所受的限制条件的这种認識，具体表現为注意地等待列强分別陷入紛乱的时机，在列强联合行动的威胁面前退让，然后乘其最紛乱之际而加以打击。这种接連发展的事件是无庸在这里举出实例而讀者就会想

起的；但是，如果要駁述日本外交政策的这种特质，最好还是回忆一下谷（干城）子爵在 1887 年所說的那段給人以极深刻印象的語句：

“修武备以策国家的安全——鼓励和保护国内的人民，然后等待欧洲变乱的发生，而欧洲变乱事实上是迟早所不免的；其事虽与我国无直接干系，但是如此一桩大事一定会同样震动东方各国，我們必須了解清楚，因此，虽就欧洲而論我国不会卷入其中，然而却可一跃而成为东方的霸主。”①②

在明治年間和明治以后，日本政治家的行动准則可以駁述如下：（一）日本始終因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为时过晚和經濟发展的不充分而受到限制；（二）列强間的目的和行动的一致性絕不能維持很久。从这两項前提所得出的結論，正如谷子爵所說的那样，在列强冲突最尖銳的时候，日本的机会即应运而至。忍耐、准确的判断和随时去作稳而且狠的打击的决心，始終是日本外交政策的特色。凭这种方法，它以比較小的力量获得了其它經濟力量比較强大的国家歷經长期战争、挫折、甚至失敗之后方才得到的成就。日本帝国在前后約三十五年之中建立了起来，其間打过三次胜仗：1894—1895 年，1904—1905 年和 1914—1918 年。日本在这几次战争中沒有一次过多地消耗了国力，在下一步的 1931—1933 年的大扩张中，以突然的襲击而割裂了中国和滿洲，更加沒有什么消耗。对本身的弱点有自知之明，加之对潜在敌国的力量有精确的估計，这是可以化凶为夷的。我們为衡量这个政策的成功，不妨提

① 引自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日关系四十年》，紐約和倫敦，1937 年版，第 13—14 頁。

② 按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第 3 卷第 465 頁所載谷干城意見书原件，应逐譯如下文：“然則今日宜取之政略如何？曰：应廢絕从来之主义政略，拋棄依賴他方之慮念，严設兵备，深此沟渠，高此城堡，对外表达信义，正威严而不为玷辱国光之事，内則發揮与民共守之志操，以待欧洲之变乱。欧洲早晚必有干戈破裂、馬蹄蹂躪中原之期。虽然我国原不应干預欧洲之变乱，但欧洲之变乱波及之处甚广，因此必搖动东洋諸国，以致东洋亦发生兵乱。故我国虽对欧洲各国无足輕重，而于东洋諸国之中欲执牛耳，为盟主，则当此之时，使我邦拥坚牢之兵舰二十艘，精锐之陆軍十万名，即可爭衡于东洋，見重于欧洲。”——譯者

一下在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初期，沙俄的龐大帝國當它的弱小鄰邦兼競爭國從一個貧困的封建國家轉變成為一個第一流的海軍國和殖民地占有國時所一再遭遇到的挫折和失敗。

但是明治改革所留下的最大烙印卻是在國內政治和經濟方面。商人和封建因素在維新之際的政治上的妥協，正如本書中所詳加說明的那樣，曾經使以往的封建領袖和封建看法能遠比在其它大多數現代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明治時代中，甚至在明治以後，企業利益始終不如在法、美之類國家中那樣得逞，也不像那樣直接承擔着政治責任。這種妥協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副產品，是官僚階級的建立，這個官僚階級在它的根源上就顯出了鮮明的封建色彩。雖然在平時它是政府的奉命唯謹的工具，可是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半獨立性，從而產生了一種團結心。

就歷史來看，這個官僚階級部分地通過以革新的封建藩閥為一方，以企業利益為另一方所體現的諸種勢力的巧妙平衡而開始占有一個獨特的地位。它隨即把這個地位鞏固了下來，接受了兵工、造船之類的軍事性的和由國家統制的各種工業的管理權。它的上層人物的大部分是從以前的封建貴族階級中選拔的，他們足能蔑視從事于瑣細法律事務的職業政客；它幾乎不容許議會之類的下級機關，甚至試圖改革或無視它的集體意志的大臣們從旁置喙。例如，1939年秋季在東京發生的外務省官員的罷工，竟致迫使首相和外相採取非常遷就的、甚至割白的態度，這是在它國所罕見的。這桩瞬息即逝但意義深遠的事件說明了官僚階級所具有的內部團結，以及如上文所述它們所享有的半獨立地位。

在為內部改造、國家安全 and 國際承認而鬥爭的年代里，這個集團是一個非常可貴的行政器官。至於現在是否如此，則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鑒於人們常常隱約說它們雖享有一定特權和豁